

让-保罗·萨特 著

辩证理性批判

林骧华 / 徐和瑾 / 陈伟丰译

李瑜青 凡人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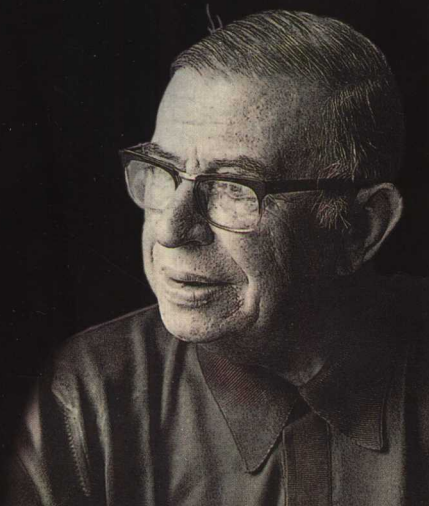
(上)

JEAN-PAUL SARTRE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安徽文艺出版社

萨特文集 · 哲学卷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让-保罗·萨特著

辩证理性批判

林骧华 徐和瑾 陈伟丰译

JEAN-PAUL SARTRE



安徽文艺出版社

编者序

让-保罗·萨特(1905—1980)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一生留下大量思想深刻、内容丰富的作品,涉及小说、戏剧、评论、哲学等多种形式,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使得萨特拥有众多读者,也使得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作为一生从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萨特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的家庭,刚满周岁,父亲因患亚洲热病离开人世。母亲无职业,没有收入,幼小的萨特随母亲回到巴黎西郊默尔特外祖父家生活。萨特的外祖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语言学教授,萨特在他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3岁时,萨特右眼因角膜翳引起斜视,继而失明,5岁时就戴上了眼镜,但他天资聪颖,4岁时便开始连猜带蒙地读书了,7岁不到,就读了莫泊桑、高乃依、伏尔泰、雨果、福楼拜等许多作家的作品。1915年,10岁的萨特进入亨利四世学校读六年级,后因母亲改嫁,随继父西迁法国港口城市罗舍尔就读,1920年又回到巴黎转入亨利四世学校。1924年,萨特以优异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专攻哲学。这所具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师范学府是近代法兰西思想家的摇

篮,是柏格森、丹纳、罗曼·罗兰的母校。萨特在那里开始了他的独立自主的生活道路。他勤奋学习,博览群书,还结识了让-伊波利特、列维-斯特劳斯等,他们后来都是法兰西思想界的风云人物。

萨特的学业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1928年毕业,萨特参加中学哲学教师学衔会考竟失败了。1929年后,萨特再次参加会考,名列前茅,就在这次会考中,他结识了一起来参加会考的西蒙娜·德·波伏娃。从此,她就成了萨特最亲密、最忠实的伴侣。经短期服役后,于1931年到1933年,萨特被委任到外省勒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但萨特对当时法国的哲学状况一直不满意,经好友介绍又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一年,研究胡塞尔、海德格尔学说。在这极为关键的一年里,萨特开始初步形成存在主义思想体系。从德国回来后,他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在课余则拼命地读书并开始大量地写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萨特平静的学术生活的影响是深刻的。在战前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可以说远离政治,对政治不感兴趣,他的著作也都偏重于心理分析,侧重于“自我”内心情感的描述。而战后,萨特就不再只满足于作内在的心理分析了,他具有强烈的介入政治的意识,积极投身于现实政治活动。萨特应召入伍,于1940年在前线被俘。1941年获释后,他辗转回到巴黎,一面教学,一面积极地投入到反法西斯的斗争中去。萨特最有力的也是唯一产生实际成效的抵抗形式就是写作。在这期间,他发表了许多作品,同时,他与左派知识分子梅洛·庞蒂、波伏娃等人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了一个名为“社会主义和自由”的团体进行活动。二战结束后不久,萨特和梅洛·庞蒂、阿隆、波伏娃创办了《现代》杂

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从此,萨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职业作家,活跃在法国和世界政治、文化舞台上。

萨特的一生在精神生活领域给人类留下的财富是极为丰富的。作为哲学家,萨特继承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学说,并又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其中《影象论》(1936)、《自我的超越性》(1937)、《情绪理论纲要》(1936)、《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1939)等著作,反映了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企图寻找一条从事情本身出发的对意识与存在、意识与自我关系的新解释,并为后来他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的完成做了理论上的准备。1943年《存在与虚无》一书的出版则宣告了作为哲学家的萨特的诞生,他开始运用自己独立的思想观点和哲学词语述说对世界的理解:人即自为的存在,具有超越的特性,他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且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实现的。正是由于它具有时间性,“自为的存在”就不像“自在的存在”那样是一种“是其所是”的存在,而是一种总是显示为“不是其所是和是其所不是”面貌的存在,人是什么只是指他过去是什么,将来并未存在,现在是一个联系着过去和将来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虚无。因此,人注定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必须自由地为自己做出一系列选择,正是在自由选择的过程中,人赋予对象以意义,但人必须对自己的所有选择承担全部责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5)是萨特为反驳外界对存在主义的批评而作的一篇著名讲演,提出并论证了“存在先于本质”这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辩证理性批判》(1960)是萨特晚期的代表作,对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作了一定的修改和总结,声称他的存在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只不过是寄生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

一种思想体系。他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但由于教条化把一切具体的活动统统归结为一成不变的阶级斗争,使马克思主义不关心处在具体环境中的特殊的人,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欠缺,使得存在主义得以存在。他要把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之中,使人重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并声称要用“人学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

萨特也是文学家,他把深刻的哲理带进了小说和戏剧。他的中篇小说《厌恶》,短篇小说《墙》,长篇小说《自由之路》和自传体小说《文字生涯》,早已被公认为法国当代文学名著。其中《厌恶》(1938)是他的第一部小说,他通过主人公——一个知识分子单身汉安东纳·洛根丁,细腻地描写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恶心感受,表现了萨特本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长篇三部曲《自由之路》,第一部《理智之年》和第二部《延缓》都发表于1945年,第三部《心灵之死》发表于1949年。在这三部长篇小说中,萨特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战争初期的岁月为背景,通过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选择,揭示他的“自由选择”的哲学主张的积极意义。《文字生涯》(1964)是萨特的自传,萨特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述了他童年的经历,深刻地分析了这不平常的经历对他的一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萨特戏剧上的成就也十分突出。他一生留下了九个剧本,在法国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著名剧本《苍蝇》(1943),是根据埃斯库勒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部曲改编,描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为父报仇的故事。萨特通过主人翁俄瑞斯忒斯向世人宣告,人们要保持尊严,维护他们自由的权利。俄瑞斯忒斯就是一个做了英雄的自由选择而成为英雄的人物,这在当时无异是法兰西

同胞发出的对德国法西斯入侵的抗议,因而剧本遭到了德国占领当局的禁演。哲理剧《禁闭》(1945),也阐释了“自由选择”的主题。它通过表现三个生前有恶行有污点或有罪过的男女,在地狱里相互纠缠、相互矛盾冲突、相互折磨的卑劣而痛苦的景象,实际上提出了一种道德上的告诫,即做卑劣的自我选择,则人们就会处在“他人即地狱”的状态,将遭受不堪的折磨,又不能自拔。文艺评论上,萨特著有《什么是文学》和三部著名的文学评传《波德莱尔》、《谢奈》和《福楼拜》,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萨特也是政治活动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他成了人类正义的捍卫者和青年革命的精神领袖。萨特曾积极投入营救亨利·马丁的活动,马丁是因散发反对印支战争传单被捕的,萨特把马丁事件和18世纪“卡拉事件”^①相比并为此四处奔走,后当局迫于群众舆论只得将马丁释放。萨特反对法国政府对阿尔及利亚的不义侵略,为此,他的住所曾两次被右翼分子炸毁。萨特拒绝领受诺贝尔文学奖,声明这纯系个人的原因,因为他“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萨特抗议美国对越南的野蛮入侵,参与并主持宣判美国侵略越南的“罗素法庭”。萨特指责前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他借参加《苍蝇》和《脏手》两剧在捷克首演式之际,勇敢地走上舞台,公开申讨前苏联的这种入侵行为。当法国左派的《人民事业报》受到政

^① 卡拉事件是当时法国的天主教会制造的一起轰动欧州的冤案:新教徒卡拉的儿子因债务缠身自缢,有人诬告是卡拉因儿子要改宗天主教而将其杀害的。于是,教会逮捕了卡拉,并施以车裂极刑,然后又当众焚尸。教会的这一惨无人道的行为激怒了伏尔泰,他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卡拉伸张正义,最后迫使最高法院撤销原判,卡拉的冤案得到昭雪。

府压制时,他挺身而出,亲自走上街头叫卖,并积极参加和声援1968年在法国爆发的“五月风暴”,认为应该对学生们用一切手段逃避异化制度的意愿表示赞赏。萨特东奔西走,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忙碌者,留下了政治评论集《境况种种》十卷之多。萨特努力促进世界和平与东西方和解,充分显示出了一种不畏强暴、不谋私利、忘我地主持正义的知识分子的高尚精神。正因如此,他被世界进步力量的朋友誉为“20世纪人类的良心”。

总之,对萨特这样一位被誉为“一代宗师”的思想家,我们从中可以汲取的精神营养是丰富的。本文集的编辑,力求较为全面而完整地反映萨特在各个方面的思想成果,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国内是第一次翻译出版。法国伽俐玛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一定意义上说,本文集也是中法友谊的结晶和象征。安徽文艺出版社对本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繁重、细致的工作,许多专家、学者对本文集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目 录

序 言	1
-----------	---

方法问题

I 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	7
II 中介问题和辅助学科问题	33
III 渐进—倒退法	73
结 论	133

辩证理性批判引论

A. 教条的辩证法与批判的辩证法	147
B. 对批判经验的批判	176

第一部

从个体“实践”到实践—惰性

A. 作为整体化的个体“实践”	215
B. 人类关系作为物质性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中介	232

C. 物质作为整体化的整体性,以及对必然性的最初体验	261
1. 匮乏与生产方式	261
(1) 匮乏是我们的历史的一种基本关系,是我们 同物质性的单一关系的偶然性规定	264
(2) 匮乏与马克思主义	280
2. 作为个体的和集体的“实践”之异化对象化的定型物质	295
作为被逆转之实践的物质	303
3. 被已定型物控制的人	330
实践—情性的实在:要求	331
利益	343
命运	353
在一般情性环境中对命运的否定	356
4. 论作为辩证研究的新结构的必然性问题	368
5. 论作为物的社会存在,特别是阶级的存在	377
D. 集合体	404
1. 系列结构,社会性的基本类型	404
2. 直接和间接的集合	422
3. 系列性和无能;循环	429
4. 阶级作为集体的存在	460
5. 实践—情性场域的可理解性	476

第二部

从群体到历史

A. 论群体——作为必然的自由和作为自由的必然的等值

——任何一种唯实论辩证法的范围和意义	505
1. 并合中的群体	509
需要的作用	510
在一个敌对的实践的压力下对系列的否定	512
作为第三者的每个人的中介	527
共同实践的特定性	546
2. 从并合中的群体到有组织的群体	577
幸存群体的矛盾结构	578
誓言,实践持久性的创造	585
誓言的可理解性:博爱—恐怖	596
3. 有组织的活动	613
功能、实践任务和人类关系	618
有组织活动作为中介的相互性的综合工作;结构	649
4. 有组织的“实践”的可理解性	677
个体实践和共同实践的同质性	678
被构成的辩证法的限制:一种超有机体的不可能性 ...	710
1)群体的单一存在(l'être-un)通过他人从外部发生于群 体。而在这第一种形式下,单一存在作为他人而存在 ...	740
2)在群体的内在性中,中介相互性的运动把实践共同体的 单一存在构成成为一种由整体化运动产生的永久非整体化	752
5. 从被组织的群体到机构	760
机构最高权力的合目的性和它的可能性的形式条件	788
最高权力和集合体:国家	816
外部制约,君主对集合体的实践模式	824

外部制约的后果:双重物化	838
B. 论作为整体化的辩证经验:它的具体层次和历史性方位	848
1. 辩证经验的循环性	855
2. 作为战斗群体、被机构化的群体和系列性的社会阶级	863
3. 历史的特异性:在匮乏场域内对抗的相互性、“实践”和过程	898
暴力实践、暴力存在和暴力过程	906
客观的阶级精神	962
4. 历史的可理解性:走向一种不起整体作用的整体化 ...	998
人名译名表	1016
法汉术语译名表	1024

序 言

我担心，这一卷中的两本书会显得长短不一、宗旨不同。从逻辑上说，第二本书应该放在第一本书的前面，因为第二本书旨在构成第一本书的批判基础。但是，我担心这样一来，第二本书山一般高的书页仿佛生出了一只小老鼠——虎头蛇尾：为了得出方法论上的几点看法，难道要如此大动干戈，花费这么多的笔墨，填满这么多的纸张？但由于第二本书实际上出自第一本书，所以我宁愿保持时间上的次序，因为从辩证的视角来看，这种次序才是最充满意义的。

《方法问题》(Questions de methode)是应时之作，因此有点杂乱；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中的问题总是用旁敲侧击的方法来论述。1957年冬，波兰的一家刊物决定出一期法国文化专刊；它想使读者了解我们这里所说的“我们的精神学派”的全貌。它要求许多作者撰稿，并建议我论述这个题目：“1957年存在主义的状况”。

我不喜欢谈论存在主义。研究工作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把研究的名称说出来、确定下来，就是把一个链环的首尾扣上了；剩下的还有什么呢？只有一种完成的、已经过时的文化形式，就像肥皂商标那样的东西，换句话说，是一种理念。要不是看到这是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国家里表达当今哲学中的矛盾的一种方法，我就会拒绝我的波兰朋友们的要求了。出于这一目的，我觉得能够围绕一种主要的对立把使哲学分裂的内部冲突集中在一起，这个

对立就是存在和知识的对立。但是,如果为了“法国”专刊的协调,我必须首先谈论存在的意识形态,我或许会更加直截了当,因为这家刊物也请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来给那几年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和发展“确定地位”。

后来,我将这篇文章重新发表在《现代》(Les Temps modernes)杂志上,但作了重大修改,以便符合法国读者的要求。现在发表的就是这个修改稿。文章原名为《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isme et marxisme),现改名为《方法问题》。最后,我提出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今天,我们是否有能力建立一种结构的和历史的人类学?这种人类学会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这点大家将会在后面看到——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因为我把存在的意识形态及其“内涵的”方法看作在使它产生并同时拒绝它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块飞地。

存在的意识形态从使它复活的马克思主义那里继承了两种要求,即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学说中汲取的两种要求:如果某种真理性的内容应该能在人类学中存在,那么这种内容应该已经变异(devenue),应该对自己整体化(totalisation)。不言而喻,这种双重的要求确定了存在和认识(或理解)的运动,即自黑格尔以来被称为“辩证的”运动。因此,我在《方法问题》中把这种整体化看作像永恒的历史和历史真理一样。从这种基本的一致出发,我力图阐明哲学人类学的内部冲突,并在某些情况下——在我所选择的方法论的领域中——勾勒出临时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但是,不言而喻,如果历史和真理没有整体化的作用,如果像实证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存在着一些历史和一些真理,那么矛盾及其综合的超越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和任何现实性。因此,我在撰写这第一本书时,就感到最终也须涉及基本的问题。是否有一种关于人的真理呢?

从未有人——即使经验论者也没有——只把理性称为我们思想的布局，而不问这种布局是怎样的。一个“理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布局必须再现或构成存在的次序。因此，理性是认识和存在之间的某种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历史的整体化和起整体化作用的真理的关系应该能够存在，如果这种关系是认识和存在的双重运动，那么，把这种变幻不定的关系称为一种理性就将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的研究目的就是要确定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理性是否正是我们在人类学的发展中重新找到的理性，或者确定人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不仅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方法，而且包含着一种新的理性，即思想和它的客体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换句话说，是否有一种辩证理性？

实际上，这不是要发现一种辩证法：一方面，辩证思想从十九世纪初开始已历史地意识到自己；另一方面，历史学的或人种学的普通经验足以阐明人类活动中的一些辩证领域。但是，一方面，经验——一般来说——通过自身只能创立一些部分的和偶然的真理；另一方面，辩证思想自马克思以来更多地关心自己的客体而不是关心自己。在这里，我们再次遇到十八世纪末分析理性在需要证明其合理性时所遇到的困难。但是，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解决，因为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解决办法就在我们后面。认识是存在的一种方式，但在唯物主义看来，不能把存在归结为已知的东西。这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还没有确定辩证理性和合理性，只要我们还无权在其意指和对发展中的整体化的综合整体参照系列中研究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个人类客体，只要我们还未确定这些人或他们的产品的任何部分的或孤立的认识应该朝着整体被超越，或者归结为一种因空虚而产生的错误，那么人类学就仍将是经验论的知识、实证主义的归纳和整体化的解释的大杂烩。因此，我们的尝试将是批判的，因为我们将试图确定辩证理性的有效性和范围，也就是确定这

种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分析理性的对立和联系。但是,我们的尝试还应该是辩证的,因为在涉及辩证问题时,只有辩证法才能解决问题。这并非同义反复;关于这点,我将在以后说明。在本书的第一卷中,我只是勾勒实践整体的理论,也就是作为整体化契机的系列和群体的理论。在以后出版的第二卷中,我将论述整体化本身的问题,即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和变异中的真理的问题。

方法问题